

舒誼:抗战时国内最先访问延安的战地记者

□陶建明

舒誼(1914—1999),原名冒舒誼、冒效庸,江苏如皋人,现代剧作家。明代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是他先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当过话剧演员、大学教授、编辑、记者,20世纪30年代著名影评人。1938年2月,他受邹韬奋委托,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写出了《战斗中的陕北》《万里风云》报告文学集,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陕甘宁边区及政府驻地延安,歌颂毛泽东、朱德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的斯诺”。

图片左起:年轻时的舒誼,舒誼和《董小宛》女主角秦怡,舒誼作品《微观断梦》,《战斗中的陕北》。



受邹韬奋委托访问延安

1937年12月20日,舒誼等几个青年记者成立小组参加广东省民众慰劳团,从广州出发去前线,经过三天的颠簸来到战时首都武汉。此时,武汉人满为患,各类人员云集。各大战区军事长官为讨论第二期抗战部署,正在武昌大本营参加会议,一时将星云集,八路军也派副总指挥彭德怀与会。

身负新闻报道任务的舒誼住下后,首先去访问邹韬奋。舒誼原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通讯员,这时《生活》改为《抗战》三日刊。邹韬奋见到舒誼很高兴,听说他即将前往华北战场采访,立即问他能否担任《抗战》的战地记者。《抗战》是当时很有社会影响的媒体,销量近万,创下那时刊物的发行纪录。舒誼接受了邹韬奋的邀请。

武汉和延安交通无阻,而中共在陕北建立的民主政权的情况,外间尚无详细的报道。虽然美国记者斯诺写过《西行漫记》,《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访问过陕北“赤区”,但都是在抗战前的事。《抗战》正需要取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新阶段,西北边区的第一手新闻资料。因此,邹韬奋希望舒誼在晋中前线访问八路军总部时,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

邹韬奋还立即与《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进行了联系,说明舒誼是以《抗战》特约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经八路军办事处同意并开具介绍信,舒誼面交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转为联系去延安采访事宜。

和朱德总司令一起过春节

1938年1月23日舒誼来到临汾,听了阎锡山抗日的“高谈阔论”。春节,舒誼率领记者团来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的安排下随卫立煌等国民党名将,赴赵城马牧集八路军总部驻地访问朱德、彭德怀。

采访团一行受到热烈欢迎。联欢会上,舒誼第一次见到朱德这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感到听朱德讲话,“就如同品尝麻辣而味浓的川菜,刺激胃口,食欲大振,非常过瘾”。

第二天上午,朱德接见了舒誼。在一个天井里,朱德和彭德怀正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舒誼刚到,朱德主动迎了上来,并引导舒誼进入堂屋。此时空袭警报响起,朱德、任弼时、陆定一、丁玲和舒誼等人一起到后院隐蔽。敌机过后,朱德与舒誼谈论起我军的抗战战局实况和战略思想。朱德指着军用地图介绍,八路军在山西的主要游击区(即晋察冀的前身)拥有正规军10万人,曾经粉碎了日军两个师团兵力的围剿。这里将成为反攻华北的根据地。八路军在

大同以南、黄河以东的区域同样活跃。朱德还解释道,关于八路军(抗日)只打了平型关战役的说法是诬蔑,完全不是事实。

舒誼询问中共“停止土改,主张国共合作”的动机。朱德立即回答:“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于1935年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5月召开的中共代表会明确指出‘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在随后的谈话中,朱德不仅向舒誼阐述了“两党共同纲领”的含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且结合两党共同纲领发表了他个人对抗战中共产党工作的看法。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是:“中共在举国一致抗战图存的局势下,要求一定程度平均分配和发展国家资本,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是正当也是合理的要求。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抗日高于一切’和‘巩固统一战线’。”朱德还真实地说明上述谈话虽是他个人意见,但也代表共产党人的看法。

“关于青年问题……”舒誼的话还未说完,朱德已了解了他的意思:“青年同志们投奔八路军的很多,但我们力量有限,而且照顾到与国民党及地方上的关系,只能尽力所及的范围,予以容纳。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是纯洁的,学习精神强,生活能刻苦,正像我党一样是不为任何报酬而工作的。”

前后近两个小时相谈甚欢,舒誼在回忆中称自己度过了一个“快慰生平”的春节。

毛泽东:“中国是一定有办法的!”

离开赵城,舒誼率领记者团来到西安,访问了留驻在此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随后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驱车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

初到延安,罗瑞卿教育长负责召开了欢迎会。他还邀请舒誼为大家演讲。舒誼虽然没有准备,但抗战肯定为主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使我们千万的青年流亡,然而我们却在穷乡僻壤上到处燃起了知识的火炬;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摧毁了我们美丽的校园,然而我们却在广漠的原野重建立起战斗的大学校……”舒誼话中的“知识火炬”显然指“延安抗大”等解放区的学校,引起了听众的共鸣,赢得了阵阵掌声。

到达延安的第十天晚上,舒誼接到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邀请通知。此时已经是深夜九点半。步行了一段路后,舒誼等人进入一间简单朴素的接待室。勤务兵送来一罐香烟,毛泽东也随即进来了。

舒誼首先向毛泽东表达谢意。随后

毛泽东向舒誼等人连连发问: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吗?统一战线在国共合作前后,有什么变化呢?……舒誼等还与毛泽东探讨国防建设的问题:抗战初期,日军优势明显,不少人对于战时的国防建设颇为失望,中国能否重建国防工业的基石,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呢?

毛泽东说:“西班牙只有几百万人口,而广东一省就有3400万人。我国土地面积广大,只要上下团结一致,各种条件改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不怕掉华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切困难自解!我们一定要建设这样的国防工业,加速地制造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最后把敌人赶出中国领土……”

毛泽东重新燃起一支烟。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不是天天打打仗,如果军队生活和军民关系改善,发展游击战争,提出运动战……就有好转的办法。但如果更有大的国防工业基础,把军队壮大起来,那么日寇也就不再最后被赶出我们的领土。”

毛泽东越谈越兴奋,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情况,无不涉及。其中对于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谈话体现了共产党的豁达态度:只要不是汉奸,其他人都应该是共产党的朋友。他还表示:鲁迅奋斗一生的精神,与我们并无二致,但鲁迅并非共产党员,像这样的人,都是我们的好友。末了,毛泽东坚定地说:“中国是一定有办法的!”

关注文化人抗战的洛甫

洛甫(张闻天),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负责人。他早年也有文学创作,而舒誼来延安前已经发表多篇有影响的影评。两位作家虽然是记者见领导,但话题的核心内容就是文学和文化人在抗战中的作用。

初春时节,舒誼在延安清凉山附近的一个窑洞里拜访了张闻天。进门时,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正在向张闻天汇报工作。舒誼眼中的张闻天“年轻而健壮,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仍不脱文人的气派。他的态度毫不拘谨,既热情又谦和,这是文学家特有的风度”。

谈话中,首先谈起国共合作,然后又谈起中共情况。“现在中国共产党总计有多少党员?”舒誼问。“目前在战时,全国党员尚无精确统计,大约有二三十万吧?除国民党外,我们作为第二大党是毫无疑问的。”洛甫答道。

舒誼询问他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评价。“过去‘左联’和‘苏联’的为革命斗争的方向和培养文化工作干部,无疑都是有功于革命的。但是,对于‘同路人’的关系上,还不能吸收更广大的同情者——我们的朋友——参加革命的阵营。”左的关门主义相当厉害,所以文化战线未能如我们的理想地扩大与坚强。”

舒誼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评价。

后洛甫又谈论了普罗文学应有的范围,并肯定了文艺作品对于抗战的帮助:“现在全国文化人分散各处,这是好现象。这样,文化人和群众的关系,更能密切,更能深入,影响也更普遍。我想今后一定能产生更好的作品。战地通讯、戏剧、歌谣……对现阶段的抗战作用很大……”采访结束,张闻天恭恭敬待,自己省下菜肴待客。

舒誼又从访问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开始,走访了边区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部门和法院、医院等的负责人,对边区的轮廓有了一个概念,参加了欢迎晚会、军民联欢晚会、抗大的运动会、陕北公学师生的反侵略大会、法院公审大会、元宵晚会等集会;参观了延安的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医院、俱乐部、消费合作社、托儿所等场所,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料。

《战斗中的陕北》

从延安回来以后,舒誼在汉口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将所见所得写出来,在《抗战》三日刊上以《边区实录》之名陆续发表,产生强烈反响。

为使更多的人了解陕甘宁边区,全面推动国共合作、实现抗战胜利的愿望,1939年3月,舒誼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报告文学集《战斗中的陕北》,由文海出版社出版,译报图书部发行。这本书分政制的轮廓、锐进的民政、困境中的财政、陕北公学、抗大、经济建设的现况、司法制度、一般文化的建设、民众运动的特质与任务、朱德与第八路军、夜访毛泽东、洛甫的会见及附录《延安行》等部分,还配有大量图片,全面系统地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卫生等情况,使后方的读者对延安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战斗中的陕北》为我党我军的抗战史留下一份宝贵的史料。在大后方公开发表,反响很大,并几度再版。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军民救国的坚定信心,宝塔山下那个“山那边好地方”的真实情景。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延安不仅仅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那里还是新中国的摇篮,理想成为现实的发祥地。中国各省的青年男女都奔赴到这里,甚至还有不少外国人。”延安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向往的“圣地”。

舒誼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一个平等、自由、没有压迫、充满活力而物质上贫困落后、极为匮乏的陕甘宁边区,它对国人全面了解陕甘宁边区,揭开延安“禁区”的神秘面纱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行对舒誼的个人创作也产生强有力的作用,他将延安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熔铸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写下了《正气歌》《精忠报国》《梅花梦》等大量抗战话剧,尤其是创作以家事为题材的《董小宛》剧本,在重庆连演二个月,场场爆满。

史海回眸

民国时期的南通本土地方银行

□嘉玺

民国年间,南通先后设立30多家银行机构,其中属于南通本土的地方银行有三家,分别是:淮海实业银行、南通县银行、南通实业银行。

淮海实业银行

淮海实业银行是百年前江苏南通大生资本集团自办的金融机构,为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张謇先生于1920年1月在南通创立的一家本土商业银行。银行总经理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协理为陈端(如皋人),行长为徐庚起(南通人,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深得张謇器重)。职员基本上是张謇所办银行专修科和甲种商业学校的毕业生。总行设在南通城濠阳路,主要业务为存款、放款、汇兑、贴现、押汇、受托有价证券及代理南通地方公债等。

早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期间,张謇曾筹划过“南通劝业银行”与“盐业银行”,当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大生各企业资金分散,缺乏主观力量,因而未能实现。

1911年,大生纱厂一厂设立大生储蓄账房收受存款,发行“支单”“钱票”,形成了金融机构雏形。

1918年1月,上海金融界拟在南通设立银行堆栈,张謇认为“通海一年中五千余万元之贸易额,而金融牛耳执之他人之手”,形势逼人,应当“急谋自立”。1919年,大生股东常务会通过议决,“提资组织银行,以为金融活动机关,现已筹备就绪,命名淮海实业银行,所有股款,拟遵照七届会议案,在本厂股东应得余利项下,提出十分之一,入淮海股份,另给收据。”此外,又通知与大生有投资关系的其他各公司,也在股东金利下择肥而扣之,同时又利用当时中国棉纺织业的有利形势,以发展地方实业的理由向外招股。于是大生集团企业的一班较大股东都不由自主地转化为淮海银行的股东。

淮海实业银行注册时,资本额号称500万元,按照当时规定,实收股本额必须达到注册资本的四分之一,即实收股本额必须达到125万元,但到1919年底实收股本额只有106万元(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大生一厂拨入款),由于“大生企业”名气在外,还是取得了经营执照。1920年1月,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正式开业。

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设上海分号、东坎分号、大中集分号、扬州分号、唐闸分理处;后又陆续增设苏州分行、南京分行、汉口分行、海门分号、镇江分理处、盐城分理处、阜宁分理处以及东台各垦区分理处。由于盐城、阜宁以及东台各垦区分理处业务大部分委托盐垦公司负责人或其会计兼理,因职权上之便利,大量资金陷入垦区。

1918年至1922年,为南通地方各实业鼎盛时期,各企业日耗调款利息很大,大生集团自立金融机构调剂盈亏,是十分有利于企业全面扩张的,故淮海银行初创时,业务发展较为正常,不到两年,分支机构就有十余处之多,其中上海、苏州两分行,及阜宁的东坎分号,存款和行往往来尤多。1921年,淮海银行年纯利16万元。

1922年下半年起,整个中国工商业全面衰退,农村经济几乎崩溃,百货滞积,盐城、东台垦区又连年灾歉,花纱价格倒悬。大生各纱厂首先资金周转不灵,无力支持其他企业,因而淮海银行存款日少,提款日多,营业萎缩。1923年以后,淮海银行的困境一年大似一年。工商业方面是放款难收;盐垦方面,不但放款利息无法结清,对面临破产的公司还须“输血”。其致命伤是淮海银行1922年认购通泰盐垦公司债票36万元及垦田押款35万元,其坑陷淮海银行资金70多万元,占实收资本额的70%,最后淮海银行只好承受35000亩的次等田,无法变现,还得建仓,派人驻垦区管理。其次为上海分行的放款拖欠,仅大生沪事所一户,即有20万元以上终未结清。海门分号亦有倒挂数万元,通燧火柴厂欠款11万元清理无偿。南通各企业股押款22万元,不赎又不能抵现者在半数以上。通海教育、慈善及公共事业垫借款项无法结清者及南通学院基产处学田押款也共有数万元。此外,1922年南通绣织局收歇,淮海银行担保偿还友华银行美汇9万元中也造成大部分呆账。因而,从1923年起,淮海银行业务上已进入应付债务阶段,最后以受押的大佐盐垦公司老庄田5000亩,向上海通商银行押款58000元,勉强处理了外界存款。

1924年至1927年,为淮海银行的停顿时期。董事会鉴于业务情况不佳,放款呆滞,现金无法周转,遂议决于1924年起总行对外不做营业,并将各分支行先后结束,最后一处为海门分号,起初该号营业似尚可为,后亦以人事关系遭受损失,遂于1927年收歇,此后长期停留于清理阶段,除对外负债大部分逐渐清理,其余没收抵押品项之下产业,一时无法处理,只有分别派员暂时保管。

1937年和1946年,淮海实业银行曾两次筹备复业。1937年第一次筹备复业,将主要账册文件携沪,委托奚玉书会计事务所审查,经其详核剩余资产及没收抵押品等,共值30余万元。旋开股东会议,决议募集优先股30万元复业,后因“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未能实现。1938年3月,南通沦陷,各行各业遭受破坏。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召开股东会议,再度筹备复业,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发动内战,金融币制紊乱异常,因亦未能实现复业。两次复业未成,由于淮海银行资金半数以上由大生集团拔款的关系,乃由大生董事会组织的保管委员会保管账册、文件及各项产业外,一时未能决定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公布私营企业条例及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淮海实业银行乃一面呈报人民政府,一面办理股权登记,并于1952年11月召开股东会议,报告最近情况,联合私股代表,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着手清理,于1953年1月20日写出《淮海实业银行清理工作报告》,遂清理结束。

南通县银行

1947年5月1日南通县银行开业,注册资本为法币1亿元。其中公股占20%,商股占80%。下设东新市场、西新市场、南新市场、濠阳路、城中、唐闸、平潮、二甲镇8个办事处。各办事处实际上都是由地下钱庄改头换面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每月需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给县银行。1948年南通县银行代理过县金库业务。南通解放前夕停业。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南通县银行资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南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南通实业银行

1948年4月16日南通实业银行开业,地址在环城南路。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曾在唐闸设立办事处。该行为股份制性质,最初资本为法币30亿元。实行金圆券政策后,该行股本折合金圆券仅1000元,遂再行集资至10万元金圆券。终因币值日落千丈,到当年年底,资本亏损殆尽,南通解放前夕停业清理。



林梓沈宅墨飘香

□苇航

在白蒲镇林梓小学校园内,有一处沈氏老宅。沈宅坐北朝南,经过修缮后灰瓦、白墙、棕门,古色古香。老宅长21米,宽7.5米,面积约140平方米,门窗相连。正门上方悬有匾额“俞铭璜沈序故居”,两侧墙面尚有一扇长方形柱条木窗。屋顶为双檐,抬梁、斗拱结构精密,且有木刻雕花,相当精致。整座建筑为典型的民国民居建筑风格。

沈宅计有四间,其中一侧房间置有老床、老橱,为俞铭璜、沈序伉俪的卧室。俞铭璜为如皋籍红色文艺评论家。他的老家位于如皋北门,惜已不见。沈序为翻译家,如皋林梓人。两人婚后从此小住,后由此北去走上抗日的道路。因此,此宅现为“俞铭璜沈序故居”。沈序生于书香门第,家族历史文化颇重。数年前,沈宅正中面积最大

的一间客厅用于布馆,展出“林梓沈氏家族史料”。1995版《如皋县志》(第155页)记载,明朝初年,沈万三被捕,沈万一、沈万二及沈万四三兄弟,被迫迁离苏州,后人分别卜居如皋吴窑、磨头、林梓(先于石庄)。康熙年间,林梓沈氏修有族谱,文人卢香作有《如皋沈氏族谱原叙》,谈及林梓沈氏的家族史:

如皋沈氏,江北名门也。其族于皋,四足并立,文人雅士,叠出不穷。白蒲鸣凤、锡庆父子一人一进进士,磨头沈卓吾系中山先生文书,吴窑沈氏亦有名人留于史册。吾祖林梓沈氏,则以书法名。幼征教授旧藏先祖《沈领小楷册页》,录领七世孙裕